

# 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马克思主义 在高校传播的多维透析\*

——以北京大学为个案

裴 植

〔摘要〕1927 年至 1937 年马克思主义在北大等国内各高校的传播，是在国民党以“整顿学风”为由展开意识形态高压、强力推行党化教育和三民主义进高校的背景下实现的。因而较之过去，它面临的形势更复杂，遭遇的困难更多，取得的成绩也更值得珍视。其间，北大开设的马克思主义课程至少有 21 门，内容涵盖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大组成部分；举办的学术讲演达数十场。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在北大的传播之所以会取得不俗的成绩，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北大马克思主义者的薪火相传、中共党组织的有效推动、北大兼容并包的学术氛围密不可分。马克思主义在北大的传播是当年其在国内高校中传播的一个缩影，生动地彰显了其理论对高校师生的吸引力。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高校；传播

〔中图分类号〕D231；K2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18)-08-0068-14

## A 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 of the Spread of Marxism in Universities from 1927 to 1937 , with a Focus on Peking University

Pei Zhi

**Abstract:** The spread of Marxism at Peking University and other universities during the 1927 – 1937 period was realized as the Guomindang forcefully exerted great ideological pressures , carried out party education , and instilled the Three People’s Principles at the universities. Unlike in the past , the situation became more complicated and difficult , and therefore the achievements were even more precious. During this period , at least 21 courses on Marxism were offered at Peking University; the content included Marxist philosophy , political economy , and scientific socialism. There were dozens of academic lectures. The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in terms of the spread of Marxism at Peking University benefited from the scientific nature of Marxism , the existence of Marxism at Peking University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 the effective work by CPC organizations , and the all-inclusive academic atmosphere. The spread of Marxism at Peking University represents a microcosm of the spread of Marxism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at that time , demonstrating the attraction of Marxist theory to both teachers and students.

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史上，高校是一个重要阵地，进步师生是一支重要力量。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全国各地多所高校竞相开设马克思主义课程、举办讲座和讲演，推动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不断扩展。当时，北京大学和上海大学堪称北方和南方高校中的典型代表。在北大，因为李大钊、陈独秀、邓中夏，以及“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等人物和团体的推动，同时有赖其“兼容并包”的学术氛围，

马克思主义“在北大的讲坛上、出版物中、社团活动中，处处都能闻到它的气息，感到它的存在”<sup>①</sup>。在上大，瞿秋白、蔡和森、安体诚、张太雷、施存统、李季、萧朴生等通过开设课

\* 本文是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 63 批面上资助项目“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文献的整理与研究（1927—1937）”（2018M631225）的阶段性成果。

① 萧超然等《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9）》，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 年，第 72 页。

程和发表讲演，使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广大青年学生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sup>①</sup>。然而，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当局以“整顿学风”为由展开意识形态高压，并强力推行党化教育和三民主义进高校，致令马克思主义在高校传播所面临的形势更复杂，遭遇的困难更多。尽管如此，基于兴趣、学养和信念而进行马克思主义传播，仍是诸多高校师生的不二选择。到20世纪30年代，全国各地高校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具体形式多种多样，而以讲授课程最为普遍。其中，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开设有“唯物史观”课程，讲授内容包括（一）唯物论在马克思学说中之地位（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三）各社会形态之发展与唯物论（四）唯心论与唯物论之异点”等<sup>②</sup>。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开设有“社会科学方法论”课程，讲授内容包括“唯物辩证法之理论及应用”等<sup>③</sup>。安徽大学教育系开设有“西洋哲学史”课程，讲授内容包括“新唯物论时期，叙述现代辩证法的唯物论之现势”<sup>④</sup>。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开设有“经济学原理”课程，讲授内容包括“生产论、货币论、剩余价值论、工资论、利润及生产价格论、商业资本与商业利润”等<sup>⑤</sup>。中央大学法学院开设有“经济学名著——马克思资本论”课程，讲授内容包括“马克思之著作、马克思思想之历史背景及其个性”和“资本论中之重要问题”等<sup>⑥</sup>。此外，中央大学、北平大学、北平民国学院、广东国民大学等开设的“社会主义史”课程，暨南大学、岭南大学、四川大学、复旦大学等开设的“社会主义”课程，清华大学、私立中国学院等开设的“西洋政治思想史”课程，四川大学开设的“欧洲政治思想史”课程，北平中法大学开设的“经济学原理”和“社会经济学”课程，私立中国学院开设的“经济学”和“经济思想史”课程，中央大学开设的“劳动经济”课程，北平大学开设的“政治学”和“社会进化史”课程，中央大学开设的“政治史”和“现代政治学说”课程，青岛大学开设的“社会学”课程，暨南大学开设的“社会思想史”课程，中山大学、四川大

学开设的“社会政策”课程等，也都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学说为重要讲授内容<sup>⑦</sup>。不过相比较而言，北京大学无论是开设课程之多，还是讲授内容之全，在国内高校中均可谓翘楚。然而截至目前，学界对于这一时期包括北京大学在内的高校马克思主义传播，重视程度相对不足，不但全面、系统的成果尚付阙如，而且以具体人物、著述、事件为对象的专论也不太多见。有鉴于此，笔者拟在搜集、梳理相关档案和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以北京大学为个案，对1927年至1937年的马克思主义在国内高校中的传播作较为细致的考察，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 一、马克思主义在北大传播遭遇的困难和挑战

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后，开始全面加强全国的政治和思想控制，遂使马克思主义在包括北大在内的各高校的传播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

1930年12月11日，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颁布《整顿学风令》，强硬表示“学生惟当一意力学，涵养身心，凛古人思不出位之训诫，奉总理三民主义为依归，不得干涉教育行政，致荒学业。如再有甘受反动派之利用，仍前嚣张恣行越轨者，政府为爱护青年，贯澈（彻）整饬学风计，惟有执法严绳，以治反动派者治之，

- ① 李向勇《论民主革命时期中共高校党建与马克思主义传播》，《党史研究与教学》2009年第2期。
- ② 参见《国立北平师范大学一览》，张研、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丛刊》第1067册，大象出版社，2009年，第165页。
- ③ 《国立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一览（1934年度）》，张研、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丛刊》第1065册，第177页。
- ④ 《安徽大学一览》，张研、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丛刊》第1088册，第179页。
- ⑤ 《国立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一览（1934年度）》，张研、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丛刊》第1065册，第222页。
- ⑥ 《国立中央大学法学院一览》，张研、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丛刊》第1082册，第415—416页。
- ⑦ 陈峰、孙顺顺《20世纪30年代大学课程中的马克思主义》，《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决不稍事姑息。”<sup>①</sup> 作为五四运动和数次学生运动的策源地，北京大学自然成为国民党当局整饬的重点，因而对其校内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期刊和学生的查禁和抓捕不遗余力。1929年1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宣传品审查条例》，明确将“宣传共产主义及阶级斗争者”<sup>②</sup> 视作“反动”宣传品。据此条例及后续法令，1930年，国民党当局出台关于查禁刊物的训令，指责北大“图书部收藏杂志刊物中内有属于中央查禁之刊物多种”，并称“由该部中携出《青年半月刊》第二十六期一本书面上有‘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部’紫色图章。经查此书皮面虽标题为《青年半月刊》，而内容实即奉令查禁之《列宁青年》。类此刊物在贵校图书部中尚复不少”。据此，国民党当局责令北大对照《查禁刊物一览表》，“自行检查，悉数送局”。<sup>③</sup> 除类似此种告知、训诫外，查禁红色期刊、解散进步社团、抓捕革命青年是国民党当局阻遏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实行思想钳制最常用的手段。而在这些方面，北京大学亦受影响最深。

根据档案记载，1931年和1932年，北京大学第一院编辑出版的《低潮》和《战旗》杂志，相继被国民党当局以“一则抨击本党领袖，肆行摇惑观听；一则极力诋毁本党并宣传共产主义”<sup>④</sup> 和“内容多系诋毁中央之言论”等为由，严令停止出版，“以杜反动宣传”<sup>⑤</sup>。1932年，仅在教育部转发行政院、军政部等关于防范共产党活动给北京大学、北平大学的训令中，北京大学就有《自决》《联友》《深光》《苏友》《新战线》共5种期刊被扣上“鼓吹阶级斗争”的帽子而遭查抄，被查抄期刊的数量为全国高校之最<sup>⑥</sup>。同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委员会第3361号密函还称“兹查获《理论与现实》刊物一种，诋毁政府并鼓吹阶级斗争，似属共匪发行。”因该刊载有“北平沙滩北京大学第一院号房转”等字样，第3361号密函即要求教育部“密饬北京大学当局严厉查究该刊物编辑人”<sup>⑦</sup>。到1933年，北京大学又有《先锋》和《社会研究》两种刊物因被定性为“确系赤匪反动宣传品”而遭查禁<sup>⑧</sup>。总之，在

国民党当局异常严酷的查禁下，“当时许多刊物不得不数次更名，或在版面上出现大块‘天窗’”<sup>⑨</sup>。

在查禁红色期刊的同时，解散进步社团也是国民党当局“甚为重视”的事情。1930年12月4日，北大社会科学研究会成立，其“大纲”声言要“以辩证法的唯物论来研究：1. 社会科学的理论及实际问题；2. 国际的及国内一切政治经济状况”<sup>⑩</sup>，并且出版《社会科学季刊》作为代表刊物。然而，该研究会的学术活动却被国民党当局视为宣传赤化的“反革命行为”。1931年，国民党北平党务整理委员会致函北大，宣称“贵校社会科学研究社系少数左倾份子假借研究社会科学之名义而阴施其赤化之宣传思想”，要求“学校当局勒令解散并惩办主动份子”，同时还请北平公安局“严密注意其活动”，甚至附上该研究会主要成员名单以便“从严取缔以遏乱萌”<sup>⑪</sup>。此外，1932年国民党当局在查禁《战旗》杂志时，鉴于该刊系由“北京

- ① 王学珍、张万仓编《北京高等教育文献资料选编（1861—1948）》，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31页。
- ②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文化”，凤凰出版社，2010年，第75页。
- ③ 《教育部、公安局关于查禁进步刊物的训令》，北京大学档案馆藏，档案号BD1930013。
- ④ 《教育部密令准中央宣传部密函该大学出版品有反动份子主持令仰从严取缔具报》，北京大学档案馆藏，档案号BD1931019。
- ⑤ 《教育部查禁进步刊物的密令及有关函件》，北京大学档案馆藏，档案号BD1932014。
- ⑥ 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学生运动史》编写组：《北京大学学生运动史》，北京出版社，1979年，第108页。
- ⑦ 《教育部转发行政院、军政部等关于防范共产党活动给北京大学、北平大学的训令及学校的函件》，北京大学档案馆藏，档案号BD1932018。
- ⑧ 《教育部关于密查“先锋”“社会研究”两刊物通讯人与北京大学的来往公函》，北京大学档案馆藏，档案号BD1933018。
- ⑨ 《北京大学学生运动史》，第108页。
- ⑩ 《北大社会科学研究会第一次执行委员会记录》，《北大日刊》1930年12月8日。
- ⑪ 《国民党北平党务整理委员会关于解散社会科学研究社给北大的来往函件》，北京大学档案馆藏，档案号BD1931013。

大学第一院战旗社所发行”，遂在“通飭各省市党部及各邮件检查厅严予查禁扣押”的同时，“密令北京大学取缔该校第一院战旗社之活动”<sup>①</sup>。

与查禁红色期刊、解散进步社团相比，抓捕革命学生无疑是更严重、更蛮横的处理方式。在这方面，国民党当局“任性”十足。1932年，国民党当局仅以北大经济系四年级学生刘文衡翻译“《伊里基主义》英译本序及其人言及论文有为共产党宣传反动之嫌”<sup>②</sup>，就将其抓捕。到1935年，由于国民党当局抓捕学生过多，北大校方不得不在期末考试前致函北平公安局，表示“查该生范铭盘、李之璉、尹景湖等，平日在校，颇知用功，操行尚优，近已学期考试在即，深恐久羁囹圄，荒弃学业，相应函请钧座查照，迅予向党部疏通，并设法保释，俾得同参加考试，以维学业”，“相同情况还有北京大学函请释放白家驹、吕翥声、马飞鹏、王举恩、吴澜滨、王德昭等”<sup>③</sup>。

为了阻止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国民党当局还采取拙劣手段罗织罪名，借以“敲打”积极分子。例如，1931年，自称是北平大学法学院学生的吴月笙、陈碧庵、袁加松联名“控告”北京大学教授许德珩、陶希圣和北平大学法学院政治系主任陈启修、教授刘侃元等“宣传共产”。“控告信”写道“现在最属可忧者厥惟共产党。仅在共产党之活跃，本党尚能镇压之而有余，其可忧复可罹者则其思想言论之弥漫是也。为其思想言论之有力传布者，则为本期北京大学所聘之教授许德珩、陶希圣，北平大学法学院政治系主任陈启修及教授刘侃元等……考其言论则无不随时宣传共产党主义，而于本党之主义及总理言论加以轻描淡写……又查以上诸人，除讲课外常聚集学生在私宅中研究马克思主义，推尊列宁为近代唯一之人物。”<sup>④</sup>根据这封“控告信”，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第22492号公函要求教育部彻查北京大学教授许德珩等宣传共产一案，随之教育部密字第182号令“密令”北京大学和北平大学两校校长等“会查具复”。虽然因北京大学

表示“具呈者并非本校法学院学生，以致所控告即无从办理”，北平大学亦表示“查属院学生名册，并无其人”<sup>⑤</sup>，此事不了了之，但国民党当局冒用学生名义编造“控告信”向高校施压，企图通过“敲打”积极分子以遏制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用心，却是十分明显。

显然，作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北京大学在1927年至1937年间受到国民党当局的诸多“关照”。国民党当局制造的意识形态高压和白色恐怖，使得这一时期包括北大在内的各高校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环境相当恶劣，遭遇的困难和挑战也相当巨大。

## 二、北大课堂教学中的马克思主义传播

1929年9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长蒋梦麟曾在一次谈话中强硬表示“刻下北平学风，坏到极点，以后方针，决取严厉手段，学生只准念书，不准干涉校政。”<sup>⑥</sup>而自其执掌北大后，他也自认为“一度曾是革命活动和学生运动漩涡”的北大“已经逐渐转变为学术中心了”<sup>⑦</sup>。但是，他未曾想到的是，其“谨守蔡校长余绪”的努力和“为学问而学问的精神”<sup>⑧</sup>，也为马克思主义在北大的传播打开了另一扇大门。毕竟，“学生惟当一意力学”本身即预设了师生之间从知识传授的角度围绕马克思主义展开探讨和交流的前提。而且，当时也有北大学人明确表示：

- ① 《教育部查禁进步刊物的密令及有关函件》，北京大学档案馆藏，档案号BD1932014。
- ② 《教育部转发行政院、军政部等关于防范共产党活动给北京大学、北平大学的训令及学校的函件》，北京大学档案馆藏，档案号BD1932018。
- ③ 《北京大学、北平大学关于释放被捕学生给北平市公安局的函》，北京大学档案馆藏，档案号BD1935021。
- ④ 《教育部密令：学生陈碧庵等三人控告许德珩宣传共产案》，北京大学档案馆藏，档案号BD1931011。
- ⑤ 《北平大学法学院学生陈碧庵等控告北京大学教授许德珩等宣传共产一案的有关函件》，北京大学档案馆藏，档案号BD1932006。
- ⑥ 《蒋梦麟谈北方教育 对八院要求复大事 谓将不惜以停办为最后之应付》，《世界日报》1929年9月28日。
- ⑦ 《蒋梦麟自传：西潮与新潮》，团结出版社，2004年，第276页。
- ⑧ 卢毅《后五四时代部分北大师生的政治倾向》，《安徽史学》2010年第1期。

“无论我们信仰马克思的议论与否，我们若留心现今社会问题，总应该加以深切的研究。”<sup>①</sup> 因此在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不仅未在北大消歇，反而继续以多种方式存在和发展，而开设课程进行课堂传播便是其中之一。

档案资料和文献记载显示：从1929年到1936年，多位北大教师开设了多门以马克思主义为主体或重要讲授内容的课程，并且几乎每年都有新的课程推出。

在北大复校运动成功不久、当局管控正紧的1929年，北大课堂上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便已开始。1929年11月27日，《北大日刊》<sup>②</sup> 刊登的“课程介绍”，就对北大教育系教师邱椿所开设的“唯物主义与教育”一课作了推介和说明：“本学科的出发点有二：（1）教育哲学的唯物史观；（2）唯物主义的教育哲学。内容分三部：（1）根本原则：讨论唯物的宇宙观、人生观、知识论，教育哲学等；（2）唯物的教育价值论；（3）比较与批评：即将唯物的教育哲学与唯心的，人文的，自然的，唯用的教育哲学比较其异同，并批评其得失。”无独有偶，据资料显示：1929年冬，北大社会科学院也曾开设“社会主义之理想及其统系”“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等课程<sup>③</sup>。顾名思义，它们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应有一定的阐述和讨论。

作为一名曾积极参加五四运动、随后留学美国并在哥伦比亚大学取得哲学博士学位、继而前往德国慕尼黑大学从事教育学研究的青年学者，邱椿无疑对当时在西方思想界影响力日增的马克思主义学说怀有学习和研究的兴趣，而“课程介绍”本身也确证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认同。而他将马克思主义引入教育学领域从而建构的“唯物主义的教育哲学”，也可以被看作是否定“唯心的，人文的，自然的，唯用的教育哲学”的一种创造性尝试。毋庸置疑，唯物史观原则及其运用是“唯物主义与教育”这门课的主导思想和重点内容。到1935年，已获聘为北大教授的邱椿又开设了“近代教育思潮”这门课，基本内容是“叙述近代六大派教育思潮”。其中，“社会主

义与民族主义”和“机械论与唯物主义”被列为第二和第三大思潮<sup>④</sup>。由此可见，唯物主义、社会主义是邱椿这位教育学教授在北大课堂上乐此不疲的讲授内容。

到30年代初，北大经济系开设了“《资本论》研究”和“马克思经济学批判”<sup>⑤</sup> 两门课程。它们之所以被开设，是因为此前“北大经济系教的都是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学生们听得都耳朵起了茧。千家驹曾回忆说“我在经济系读了四年，对经济系的课程却一门也没有好好听过。什么‘边际效用说’，什么凯恩斯的‘充分就业论’，都不屑我一顾。我自己整天关在宿舍里死啃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理论。凡是当时北京可以买得到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均为英译本，中译本极为少见），如《资本论》、《反杜林论》、《哲学的贫困》、《政治经济学批判》等等，我都仔细地阅读。”<sup>⑥</sup> 既然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着浓厚的兴趣，于是北大经济系尝试添了两门选修课，一门是“资本论研究”，一门是“马克思经济学批判”，讲师为同一人。千家驹回忆说“我当时喜出望外，就去听他的《资本论研究》。那（哪）知这位讲师对《资本论》竟一窍不通，他手里拿着一本英译《资本论》第一卷，书还是新的，大概买回来不久，照本宣读，把英文译为汉语。《资本论》第一章是商品，小标题是使用价值与

- ① 邓秉钧《马克思生平及其著作》，《北大学生》创刊号，1930年。
- ② 据查，《北京大学日刊》在1929年4月13日至1931年9月5日期间，改名为《北大日刊》，1931年9月9日，重新恢复《北京大学日刊》的名称。
- ③ 《社会主义及苏联文献展览说明》，参见《国立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特刊》，国立北京大学出版部，1948年，第3页。
- ④ 《国立北京大学一览（1935年度）》，张研、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丛刊》第1063册，第173页。
- ⑤ 《马克思经济学批判》这门课的名称，千家驹在《我在北大》一文中写作“马克思主义批判”。参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95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4年，第45页。
- ⑥ 千家驹《我在北大》，《文史资料选辑》第95辑，第47页。

价值（价值实体与价值量），我就站起来问他，括弧里的价值实体与价值量是指‘使用价值’与‘价值’呢，还是指价值中又分价值实体与价值量呢？那（哪）知道他一解释便完全错了，他被我问得面红耳赤下不了台。下课之后，我给这位老师写了一封信，内容是说：‘……对你讲《资本论研究》，我却不能同意，因为我发现你对《资本论》一无所知，所以希望你把这门课停掉。’<sup>①</sup>从千家驹的回忆看，尽管由于任课老师知识积累不足，现学现卖，从而导致课堂讲授效果不佳，但是这两门课的开设却是不争的事实。附带一提，“《资本论》研究”课程的开设与蒋梦麟的态度也有着直接的关系。近来，也有人撰文指出：蒋梦麟主张实行学术民主，曾“亲自规定马克思的《资本论》是经济系的必修课”<sup>②</sup>。

这一时期，北大经济系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热情普遍很高，因而该系开设的相关课程也较多。1931年，该系教授陈启修就为四年级学生开设了必修课“马克思经济学说及其评判”<sup>③</sup>。1932年和1933年，他又相继开设了选修课“马克思经济学说及其批评”和四年级必修课“马克思经济学说”等课程<sup>④</sup>。他精通多国语言，且思想敏锐，能讲善写，堪称当时北大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中的一位佼佼者。他一方面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经济学的最新知识，通过课堂讲授给学生，另一方面又善于联系各种学术思潮和社会实际，作出自己的分析判断和概括总结，从而结撰出若干重要成果。其中，1931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十讲》上册、1932年出版的《社会科学方法论》、1933年出版的《经济学讲话》和《经济学原理十讲》下册，都是他在北大等高校授课讲义和听讲者笔记的基础上“大加补削而成”<sup>⑤</sup>。千家驹回忆说：陈启修“是北大的名教授”，“是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非常叫座”<sup>⑥</sup>。由于学生们对于听陈启修的课充满兴趣，因而后来当他们听说“陈启修下学年有离开北大消息”之后，就“向学校及陈启修询问真象（相）”，并“设法挽留”<sup>⑦</sup>。

除了陈启修之外，秦瓚、赵乃抃两位教授也在北大经济系分别开设了讲授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课程。秦瓚早年留学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取得经济学硕士学位后回国，自1928年起担任北大经济系教授，到30年代初开课讲授“马克思学说研究”。据资料显示，此后秦瓚教授还多次开设过这门课。<sup>⑧</sup>“马克思学说研究”的讲授内容包括：（一）马克思的哲学；（二）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三）马克思的批评者。<sup>⑨</sup>可见，秦瓚这门课所讲的内容，除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外，还涵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值得一提的是，一些站在马克思的对立面、作为马克思学说批评者的学者，其批评意见也被秦瓚纳入课程的内容中，这是十分可贵的，体现了其学术气度和对于马克思主义真理属性的确信。赵乃抃于192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1923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经济理论，1929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取得哲学博士学位，1930年回国，1931年被聘为北大经济系教授。从这年开始，他为经济系一到四年级学生开设了“经济学原理”“英文经济学选读”“经济理论”等课

- ① 千家驹《从追求到幻灭：一个中国经济学家的自传》，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香港），1993年，第56—57页。
- ② 李忠、叶向忠等《继承北大“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遗产》，《炎黄春秋》2008年第6期。
- ③ 参见《法学院院长布告》，《北京大学日刊》1931年9月22日。
- ④ 萧超然等著《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9）》，第202页。检诸萧超然等人的《北京大学政治学系与行政管理学系系史》一书所载政治系1933年度和1934年度课程表，陈启修开设的课程为《马克思学说研究》，是为经济系、政治系四年级学生合开的一门课。
- ⑤ 陈豹隐《经济学讲话》自序一，好望书店，1933年。
- ⑥ 千家驹《我在北大》，《文史资料选辑》第95辑，第45页。
- ⑦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四），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96页。
- ⑧ 北京大学校史馆《1929—1936年北京大学开设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的课程》。
- ⑨ 《国立北京大学一览（1935年度）》，张研、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丛刊》第1063册，第255—256页。

程。1933年，他又新开了“社会主义”一课<sup>①</sup>。对于这门课的内容，有资料显示“内容分空想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其他社会主义等”<sup>②</sup>。可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肯定是“社会主义”这门课程的重点讲授内容。此外，他在1935年主讲“经济学史”，其内容“从重商主义及重农主义之经济政策和经济思想进而研究经济学之发展；由英国古典学派之学说推求美国学派，法国学派，德国学派，奥国学派之特征（此推求与社会主义史及现代经济理论相衔接）”<sup>③</sup>。显然，社会主义在讲授内容中也占有一定的比重。

政治系教授许德珩这时也开设了同类课程。他曾在五四运动中担任北大学生领袖，后来赴法国勤工俭学，回国后几经辗转，于1931年被北大聘为教授。当年，他就为经济系、法律系的二年级和政治系的三年级合开了必修课“社会学”，还为经济系、政治系的二年级合开了选修课“社会进化史”<sup>④</sup>。1932年，他继续开设“社会进化史”。1933年至1934年，他又开设了“社会制度研究”等课程<sup>⑤</sup>。“社会制度研究”这门课，“内容分封建制度、近代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三部分”<sup>⑥</sup>，“一般地讲述社会制度之起源、发展和变革的总过程。其中特别注意的有三点：（a）欧洲中世纪社会所经过的 Feudalism 封建制度——从研究封建制度之经济的、法律的、政治的以及思想和形态来观察中国历史上封建制度之性质及其经过的程序。（b）近代资本主义制度——研究近代资本主义之发展及其特质；资本主义发展于中国社会之影响。（c）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之经济的建设，及其政治的法律的趋向”。在课程介绍所附的参考书中，明确列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和日本学者关于唯物史观的教材<sup>⑦</sup>。据1935年的《国立北京大学政治学系课程一览》显示，他还为政治系三年级“政治制度组”和“国际关系组”的学生开设了“社会学本论”一课。1936年，他又出版《社会学讲话》上卷，并在自序中讲道“这本书是几年以来在各大大学担任社会学课程的一种讲义。”后来，他回

忆说《社会学讲话》上卷乃是“把历年教书的讲义重新加以整理”<sup>⑧</sup>而成。检视该书内容可知，“历史的唯物论”“唯物辩证法”是其最基础、最核心，同时也是篇幅最大的部分，并且对一切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以及对一切人物思想学说的分析评价，无不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的。既然如此，那么在其课堂讲授中，马克思主义理论无疑就是主体性的一个部分和贯穿其中的一根红线。

卢郁文也是讲授同类课程的人物之一。他于1929年至1931年间留学英国，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取得经济学硕士学位后回国，获聘北大经济系讲师。1931年至1934年，他主讲“经济学概论”。1933年，又开设“劳动运动及社会主义史”。1935年，课程名称微调为“劳工运动及社会主义史”。这门课包括两大方面的内容：一是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首述乌托邦社会主义，次述科学社会主义，末述其他社会主义，如费宾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工团主义，基尔特主义等”；二是劳工运动，“首述劳工组合之起源及机构，次述劳工运动之三个途径（政治的，经济的，合作的），末述劳工运动之国际的发展（第一，二，三国际）”<sup>⑨</sup>。据此可知，科学社会主义和世界工人运动发展史是这门课的重要内容。

- ① 北京大学校史馆《1929—1936年北京大学开设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的课程》。
- ② 《社会主义及苏联文献展览说明》，参见《国立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特刊》，第3页。
- ③ 《国立北京大学一览（1935年度）》，张研、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丛刊》第1063册，第245页。
- ④ 参见《法学院院长布告》，《北京大学日刊》1931年9月22日。“社会学”这门课，到1935年几乎每年都要开设。
- ⑤ 萧超然等编《北京大学政治学系与行政管理学系系史》，内部资料，1998年，第24—25页。
- ⑥ 萧超然等《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9）》，第203页。
- ⑦ 萧超然等编《北京大学政治学系与行政管理学系系史》，第31—32页。
- ⑧ 《为了民主与科学——许德珩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87年，第205页。
- ⑨ 《国立北京大学一览（1935年度）》，张研、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丛刊》第1063册，第247页。

除了上述诸人之外，这一时期，北大还有若干教师主讲的某些课程对马克思主义相关内容有较多涉及。例如，张奚若于1931年至1935年间连续开设的必修课“西洋政治思想史”（其中1934年由萧公权主讲），其内容“讲述欧洲自上古至现代各重要政治思想家之政治学说，及其在历史上之影响。尤注重希腊及近代著名思想家，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浩布斯（即霍布斯）、洛克、卢梭、赫格尔（即黑格尔），及马克思（即马克思）等”<sup>①</sup>。马克思既然被张奚若推崇为近代著名思想家，那么后者在课堂上关于前者政治思想的讲授，自然不会单薄。再如，陶希圣在1931年秋被聘为北大教授后的数年间，是时人公认的国内“第一批用社会学的眼光来研究古史的人”。“所谓‘社会学的眼光’，实际便是历史唯物论的别样讲法。”<sup>②</sup>当时的学术新锐郭湛波曾评价说“中国近日用新的科学方法——唯物史观，来研究中国社会史，成绩最著，影响最大，就算陶希圣先生了。”<sup>③</sup>而1931年进入北大读书、与陶希圣有师生关系的何兹全后来也“不持偏见、公平”地回忆说“主编《食货》半月刊和在北京大学教书时代的陶希圣，他的历史理论和方法正是辩证唯物史观。使陶希圣高明超出他的同辈史学家的正是他的辩证唯物史观。”<sup>④</sup>何兹全还在回忆时坦承“在北大四年，对我影响最大的是陶希圣。他开‘中国社会史’和‘中国政治思想史’两个课程，在课堂里他讲‘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引了不少人听他的课。我走上研究中国经济史和社会史的路，不能说不是受了他的影响。”<sup>⑤</sup>陶希圣也曾明言“民国20年至26年（1931—1937年），我在北京大学讲课及演说，又往天津、济南、太原、南京、武昌讲课及演说，全是以社会史观为研究古来历史及考察现代问题之论点与方法……我所持社会史观可以说是社会观点、历史观点与唯物观点之合体。”<sup>⑥</sup>可见，陶希圣任教北大期间，在讲授“中国社会史”等课程时，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是被作为考察分析中国社会等问题的方法论指导来使用的，

而他的课之所以受到普遍欢迎，正与他对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的融会贯通及熟练运用密切相关。

综上所述，1929年至1936年，北大开设的马克思主义课程至少有21门。这些课程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以马克思主义为主体内容，包括“马克思经济学说及其评判”（陈启修）、“马克思经济学说及其批评”（陈启修）、“马克思经济学说”（陈启修）、“马克思学说研究”（秦瓚）、“《资本论》研究”（佚名）、“马克思经济学批判”（佚名）等，凡6门；第二类以马克思主义为重要内容，包括“唯物主义与教育”（邱椿）、“社会主义之理想及其统系”（佚名）、“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佚名）、“社会主义”（赵乃抃）、“社会学”（许德珩）、“社会进化史”（许德珩）、“社会制度研究”（许德珩）、“社会学本论”（许德珩）、“劳动运动及社会主义史（劳工运动及社会主义史）”（卢郁文）等，凡9门；第三类以马克思主义为内容之一，包括“西洋政治思想史”（张奚若）、“中国社会史”（陶希圣）、“中国政治思想史”（陶希圣）、“经济学史”（赵乃抃）、“近代教育思潮”（邱椿）等，凡5门。当然，这样的一种划分只具有相对的意义。

### 三、北大学术讲演中的马克思主义传播

学术是高校赖以立足的根本。在蔡元培打下的坚实基础和蒋梦麟的大力倡导下，1927

- ① 参见萧超然等编《北京大学政治学系与行政管理学系系史》，第24—31页。
- ② 李红岩《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思潮兴起之原因探析》，《文史哲》2008年第6期。
- ③ 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63页。该书于1935年由北平人文书店以《近三十年中国思想史》为题首次出版，1936年增补后改名为《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再度刊印。
- ④ 何兹全《我所经历的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2期。
- ⑤ 邹兆辰《我的人生与治学之路——访何兹全教授》，《变革时代的学问人生——对话当代历史学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页。
- ⑥ 陶晋生《陶希圣论中国社会史》，《古今论衡》1999年第2期。



年至1937年之间，北大的学术气氛空前浓厚，其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学术讲演的热烈开展。对于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在北大的传播来说，学术讲演是一种重要的形式和平台。

在通过学术讲演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活动中，教授是一支重要的力量。而发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讲演，对北大教授而言是一个历史传统。早在1921年7月，北大政治系教授陈启修，就曾在砺群学会作了题为《社会主义底发生的考察和实行条件底讨论与他在现代中国的感应性及可能性》的讲演。1922年5月5日，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举行马克思诞辰104周年纪念大会，他与李大钊、顾孟余、高一涵等都在北河沿法科大礼堂发表了讲演。1925年5月5日，在由广东全省学生联合会、香港学生联合会、中华全国总工会等团体共同发起的，于广东大学礼堂隆重举行的纪念马克思诞生107周年大会上，他又以北京大学教授的身份出席并发表了关于马克思生平及其学说的讲演。30年代，他继续在课堂讲授、著书立说和学术讲演三大领域齐头并进，取得不俗的成绩。就学术讲演而言，1931年6月，正当欧美资本主义世界遭遇严重经济危机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却高速推进之时，他以《产业合理化》为题，系统阐述了资本主义各国和苏联因制度不同而在产业合理化方面导致的不同结果，并得出结论，即“资本主义合理化因为目的上的差异，和统制力上的强弱远不及社会主义合理，其结果也当然不可同日而语。所以前者的结果，好似回光返照，不几年间就发生大恐慌，而后者前途正方兴未艾”<sup>①</sup>。这篇讲演的价值在于：它除了揭示资本主义难以克服的弊端和社会主义的光明前景外，还在相当程度上填补了中国学术领域的一项空白。据讲演的记录者林伯雅所言“产业合理化，是现代一个重要的特殊经济问题，和世界恐慌，有密切的关联；想明了世界恐慌的现状和趋势，不可不先了解它。这个问题在欧美各先进国家，早有普通的研究而且快要变为陈旧了；在中国到现在却还算是一个新颖的问题；学术界对于它的空气，依然十

分沉寂。虽间有零篇短稿，出现书坊，然而有系统的研究，极其少见”，而陈启修的这篇讲演则“广博精辟，我们认为有介绍的必要；因此把它笔记下来，付之《北大学生月刊》，藉供社会人士的参看”<sup>②</sup>。事实上，在30年代的北大，陈启修是颇受学生欢迎的学者之一。郁达夫曾回忆说“据北平来的人谈，在北平的大学教员中，胡适而外，陈启修可以算是一个红教授——这个所谓红，当然不是说他的思想赤化，而是他尚为一般学生所欢迎的意思。”陈启修之所以受到学生的欢迎，当然与他时常谈及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相关名词存在着直接的联系<sup>③</sup>。

除了陈启修从经济学角度对社会主义所作的揭示外，邱椿也从教育学角度作了类似的推进。1929年11月10日，他在北大第二院大讲堂，为北大教育学会的师生作了题为《社会主义的教育》的讲演。前已述及，邱椿在美国和德国留学多年。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具有系统的西方教育背景的学者，却对社会主义的教育赞不绝口。例如，他在讲演中强调“社会主义的教育不是资本主义的教育”，“社会主义的教育是养成勤劳知足安分的工人”，“社会主义的教育是和平的，自由的……是世界的，大同的”，“社会主义的教育，是无产阶级共有共管共享的教育，这种教育可以说是完全站在无产阶级的利益上的教育理论与实施”，等等。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的教育比欧美资本主义的教育层次更高，更能代表全人类的意愿。他说“美国的教育使人合作互助以发展资本家的利益……英美的教育，虽是发展个人的天才养成领袖，但不是为民众而奋斗的领袖”，而社会主义的教育一个重要特征是“平民劳动阶级的教育”，其目标在于“养成互助合作的习惯，以发展无产阶级的利益”。在讲演的最后，他甚至乐观地表

① 陈启修《产业合理化（续）》，《北大学生》1931年第5—6期。

② 陈启修《产业合理化》，《北大学生》1931年第4期。

③ 郁达夫《陈启修的党生活》，《当代史剩》，上海周报社，1933年，第337页。

示 “旧教育已陷于四面楚歌的绝地，不久就要寿终正寝了，只有社会主义的教育足以救国，只有社会主义的教育，足以医治中国教育之宿病。”<sup>①</sup> 他的这篇充满对社会主义期待和向往的讲演经人整理后，先是在《北大日刊》1929年11月23日至12月4日连载刊出并引起极大的反响，后又被《山东教育行政周报》和《陕西教育周刊》转载，从而使他的社会主义教育观、特别是他所倡导的体现马克思主义立场和观点的社会主义教育学说，在全国各地得以传播

开来。

马克思主义在北大的传播也少不了学生的身影。如果说他们在课堂讲授形式下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只是被动的接受者，那么在学术讲演的平台上则俨然成为一支不可小觑的生力军。查考《北大日刊》可知，自1929年5月至1931年5月的短短两年中，北大学生发表的明显含有马克思主义思想元素的讲演就有20人次之多，其中又以1930年最为密集，仅在12月就达13人次。具体情况见下表。

表1 1929年至1931年北大学生含有马克思主义思想元素的讲演统计

日期	主办者	讲演者	题目
1929.5.21	北大演说辩论会	李乐侗	革命的人生
1929.6.4	北大演说辩论会	夏次叔	政治理想应建筑在平等的经济基础上
1929.12.5	北大演说辩论会	蔡宾王	帝国主义协谋之危机与我国应付之方略
1930.11.28	北大演说辩论会	冀丕扬	资本主义的世界系统，其发展与其必然的灭亡
1930.12.2	北大演说辩论会	张清丽	苏联五年计划的国际影响
1930.12.2	北大演说辩论会	陈嘉琨	我对于极端唯物论的讨论及我见
1930.12.5	北大演说辩论会	徐才炽	从经济的观点推世界政治联合之趋势
1930.12.5	北大演说辩论会	徐万军	王莽的封建社会主义
1930.12.5	北大演说辩论会	杨尔璜	形式论理学与辩证法
1930.12.8	北大演说辩论会	徐 权	新文学的认识
1930.12.11	北大演说辩论会	梁辉章	资本主义的世界系统，其发展与其必然的灭亡
1930.12.12	北大演说辩论会	冀丕扬	资本主义的世界系统，其发展与其必然的灭亡
1930.12.16	北大演说辩论会	徐 权	新文艺的认识
1930.12.19	北大演说辩论会	杨尔璜	机械唯物论底缺陷
1930.12.19	北大演说辩论会	王衍礼	苏俄新经济政策及其五年计划的比较观
1930.12.19	北大演说辩论会	徐 权	赣东红色区域的状况
1930.12.19	北大演说辩论会	郭樹松	台湾革命与东方殖民地解放运动
1931.3.6	北大演说辩论会	杨尔璜	旧唯物论底批判
1931.3.6	北大演说辩论会	王象咸	谈谈帝国主义
1931.5.15	北大演说辩论会	王俊让	帝国主义给予中国智识阶级的影响

说明：表中内容系根据《北京大学日刊》第15、16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整理而成。

纵览表1所列题目，不难发现，北大学生们的讲演内容有一个不同于教授们的显著特点，

即关注的问题相对集中且现实感较强，这显然与青年对时代和社会问题的极度敏感有关。在

<sup>①</sup> 邱椿 《社会主义的教育》，《北大日刊》1929年11月26日、1929年11月26日、1929年11月23日、1929年11月26日、1929年12月1日。

民族危机深重、时局动荡不安的30年代，基于“为中国寻找根本出路的殷切政治情怀”<sup>①</sup>，北大学生不约而同地把批判资本主义、探讨苏联成就、关注革命运动作为讲演的焦点和重心。而在上述诸多颇具现实特征的讲演题目中，也有杨尔璜的《形式论理学与辩证法》《机械唯物论底缺陷》《旧唯物论底批判》等涉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术性讲演。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讲演活动并非北大学生自娱自乐的小众行为，而是有着超出北大范围的广泛影响。1929年5月15日，《京报》在题为《北大学院演说辩论会昨举行练习会》的报道中写道“闻昨日到会听讲者，除会员外，并有非会员及他校学生云。”<sup>②</sup>而据《演说辩论会简章》可知，学生们的每次讲演活动均有北大教师出任导师，负责“在本会每次演习时评定演员之优劣，并指导其得失”<sup>③</sup>。其中，1929年5月14日的演说辩论会，邀请了“导师鲍明铃、马裕藻评判”<sup>④</sup>。5月20日举行的一次练习会，邀请了“导师黄右昌、刘半农出席指导”<sup>⑤</sup>。1931年5月15日举行的北大演说辩论会第35次练习会，邀请了陈启修、秦瓚作为导师出席指导。另据《北大日刊》记载，1930年11月7日，北大演说辩论会通过了添聘导师的议题，决定“陈大齐、王烈、何基鸿、樊际昌、刘复、黄右昌、秦瓚、王化成、浦薛凤仍续聘外，兹添聘陈启修、胡适、杨子馥、嵇文甫诸先生为本会导师”<sup>⑥</sup>。添聘之后的演说辩论会导师名单几乎涵盖当时北大最知名的学者群体，其中陈启修等则是以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而著称的学者。总之，通过北大演说辩论会等相关社团平台的搭建，以及师生之间的有效互动，北大马克思主义传播就具备了较为稳定的受众群体和比较可靠的渠道保障。

#### 四、马克思主义在北大得以传播的原因分析

由上述可知，虽然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在北大的传播面临着非常不利的形势，但是仍然在课堂教学和学术讲演等活动中持续有效地进

行着。究其原因，大致包含以下几方面。

##### （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使然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是马克思主义突破重重障碍、在北大得以持续传播的最根本原因。作为“伟大的认识工具”和“人们观察世界、分析问题的有力思想武器”<sup>⑦</sup>，马克思主义自其创立之日起，就是在被敌视和排斥的环境中发展起来并逐渐扩大影响的。特别是到了19世纪后期，随着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不断尖锐与激化，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本质的揭露和批判日益深入人心，辩证唯物主义方法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被越来越多的人尊重和信仰。事实上，1927年至1937年间，北大学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已形成比较清醒的认识。当时，北大哲学系教师邓秉钧面对马克思“一方面受人骂，一方面又受人极端的崇拜”的矛盾现象，充分肯定了马克思运用辩证法“深观默察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灼然见得其中含有极大之相反性”，以及因此而作出的“将来必使其自身颠覆”的科学判断。他明确表示“无论我们信仰马克思的议论与否，我们若留心现今社会问题总应该加以深切的研究”，“这是无论何种政治信仰的人所不能否认的”<sup>⑧</sup>。而在北大求学期间就撰写了《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一书的郭湛波，在谈及其书所使用的方法时说“本书自有一种观点和方法，所用的方法是新的科学方法——即唯物辩证法和辩证法唯物论——作者之所以用这种方法，并非有什

- ① 程美东《为寻路而进行的文化批判》，《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6月17日。
- ② 《北京大学史料》第2卷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693页。
- ③ 《北京大学史料》第2卷下册，第2693页。
- ④ 《北大演说辩论会通告五月十三日》，《北大日刊》1929年5月14日。
- ⑤ 《北京大学史料》第2卷下册，第2693页。
- ⑥ 《北大演说辩论会开会会员全体大会记事》，《北大日刊》1930年11月10日。
- ⑦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8日。
- ⑧ 邓秉钧《马克思生平及其著作》，《北大学生》1930年创刊号。

么成见，和信仰什么主义；只是相信在今日只有这种方法能解决问题，较为妥当，不得不用它”<sup>①</sup>。可见，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科学性是包括北大学人在内的先进分子克服外界造成的障碍，推动马克思主义在各个领域广泛传播的最根本的原因。

## （二）北大马克思主义者的薪火相传

众所周知，李大钊、陈独秀是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的代表，是马克思主义在北大乃至全国传播的领军人物。1927年4月，李大钊不幸被奉系军阀逮捕杀害。而在此前，陈独秀也因从事革命事业而离开了北大。但是，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播下的种子已经在北大生根发芽。在北大马克思主义者的成长过程中，李大钊无疑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郭湛波曾高度评价李大钊在马克思主义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指出：他“是唯物史观最彻底最先倡导的人；今日中国辩证法，唯物论，唯物史观的思潮这样澎湃，可说都是先生立其基，导其先河；先生可为先知先觉，其思想之影响及重要可以知矣”<sup>②</sup>。许德珩也曾亲承李大钊对其思想、人格的影响。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大钊同志刚来北大任图书馆主任时，我就结识了他。素仰其人的我，能够得以亲聆教益，十分欣喜。”<sup>③</sup>在许德珩眼中，李大钊总是“以诚朴谦和的态度，含着微笑热情地接待向他求教的青年，诚恳而细致地畅谈自己的看法”<sup>④</sup>。更令许德珩钦佩的是李大钊对世界大势的认知和把握。他认为：“惟有大钊同志不同凡响，他发表了题为《庶民的胜利》的著名讲演……揭示了战争爆发的真正原因，传播了关于战争的深刻根源是存在于经济事实之中，是在于资本帝国主义制度。这就从根本上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sup>⑤</sup>如果说许德珩是以李大钊学生的身份接过了北大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接力棒，那么陈启修则是起初与李大钊一起协力推进北大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同伴。早在留学日本期间，他就参加了李大钊提议的丙辰学社的筹建，“通过丙辰学社的筹建，他和李大钊建立了亲密友谊”<sup>⑥</sup>。1919年秋，他来到北大法商学院任教，从而与李大钊

建立了更加紧密的联系。1920年，他开设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概论。同年9月，他与李大钊合作，在北大政治系举办“现代政治”讲座，讲授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俄国、世界各国工人运动的情况以及中国劳工状况等内容。1921年，他在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资本论》研究组担任导师，指导学生学习《资本论》。在1922年5月5日举行的马克思诞辰104周年纪念会上，他又与李大钊、高一涵等作了讲演。<sup>⑦</sup>30年代初，他从国外回来后依然在北大的讲坛上传播着马克思主义的真知灼见。1932年，他在北大经济系开设“马克思经济学说及其批评”课程，作为选修课向全体学生开放。1933年下半年，他把这门课程改名为“马克思经济学说”，并使之成为法学院政治系、经济系四年级学生的必修课。除此之外，他还发表了多篇探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问题以及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实际问题的文章，从而在北大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书写了重要的一页。

## （三）北大党组织的有效推动

中共成立后，北大的基层组织也应运而生。然而，到1930年前后，北大党组织多次遭到破坏，开展革命活动异常艰难。1932年10月8日，中共河北省某巡视员在写给其省委的报告中说：此期北大“党只有五人，没有发展，团由五人减到三人，反帝由二十余人减到十五人，社联只有五人，左联也只有四五人”<sup>⑧</sup>。然而，即便是在敌人异常强大、自身实力弱小的

① 郭湛波 《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再版自序，第5页。

② 郭湛波 《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第103页。

③ 《为了民主与科学——许德珩回忆录》，第35页。

④ 《为了民主与科学——许德珩回忆录》，第35页。

⑤ 《为了民主与科学——许德珩回忆录》，第37页。

⑥ 《陈豹隐——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光华财税年刊2005》，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54页。

⑦ 参见《陈豹隐——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光华财税年刊2005》，第155页。

⑧ 中央档案馆、河北省档案馆合编《河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10册，内部资料，1997年，第15页。

情况下，北大党组织也没有放弃推动党员和进步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工作。1929年刘少奇赴北大巡视指导党的工作时，北大党支部文化教育干事傅于琛向他汇报说“知识分子必须加紧对社会科学研究……我表示赞同当时出现的赶学日文，钻研政治学、经济学、哲学、社会发展史等社会科学的学习热潮。”刘少奇也明确指示“我们要认真学习社会科学，学习马列主义的革命理论……要通过对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的研究，正确地分析阶级斗争和政治形势。”<sup>①</sup>即便在革命遇到暂时挫折时，北大的中共党员也没有失去信心，而是通过学习革命理论来坚定理想信念。“北大在校同志一方面因许多同志牺牲而感到悲痛；另一方面由于革命失败而感到惶惑。为了认清革命的前途，大家都感到有学习革命理论的必要。”<sup>②</sup>事实上，北大的中共党员对于学习革命理论的诉求，和北大作为高等学府所具备的优势，是正相契合的。在当时，一方面陈启修、许德珩在北大讲学，为进步青年了解、学习马克思主义起了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作为文化古都，北平有较多进步书籍可供阅读，包括“《资本论》和马恩全集都有出版”。基于这样的便利条件，在校党员“转向革命理论的探讨，而且兴趣极高，纷纷成立读书会之类的社团组织”<sup>③</sup>。以毕业后留校任教进而加入中共的夏次叔为例，他就是在校期间通过认真学习“李大钊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毛泽东先后在《中国农民》和《向导》上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逐渐认识到“中国的前途不是‘三民主义’而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希望不是蒋介石控制的国民党，而是中国共产党，只有中国共产党才代表中国的劳苦大众，也只有劳苦大众的参与中国革命才有光明的前途”<sup>④</sup>。可见，虽然这一时期北大党组织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多以分散、个体，而非集中、组织的形式进行，但在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方面，依然取得显著的成绩。

#### （四）北大兼容并包校风的保驾护航

自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以后，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成为北大最鲜明的校风。30年代初，蒋梦麟在《北大之精神》一文中写道“本校具有大度包容的精神……本校自蔡先生长校以来，七八年间这个‘容’字，已在本校的肥土中，根深蒂固了。故本校内各派别均能互相兼容受”，“本校具有思想自由的精神……本校里面，各种思想能自由发展，不受一种统一思想所压迫，故各种思想虽平时互相歧义，到了有某种思想受外部压迫时，就共同来御外辱”<sup>⑤</sup>。蒋梦麟对北大精神的概括，既是出自对蔡元培时期北大历史的回顾，也是他本人掌舵北大期间的理想与追求。

北大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从前述许德珩、陶希圣两教授遭到“控告”后北大的回应中即可得到印证。国民党当局因所谓“北平大学法学院学生陈碧庵等呈控北京大学教授许德珩等宣传共产”，责令北大和北平大学“会查具复”。北大校方在一纸复函中，以“具呈者并非本校法学院学生”为由驳回当局的要求，而对许德珩、陶希圣“宣传共产”的指控则未置一词、不予理会。在数次就查禁进步期刊与当局的交涉中，北大的复函也每每以“查本校各学院并无此种团体名称，显系有人借名义淆惑社会视听”<sup>⑥</sup>、“查本校学会名单，并无先锋社之名，全校学生中又无名刘北新者……严询第一院号房工役，亦坚称未代该两刊物传递信件，

- ① 王效挺、黄文一：《战斗的足迹——北大地下党有关史料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36、237页。
- ② 王效挺、黄文一：《战斗的足迹——北大地下党有关史料选编》，第233页。
- ③ 王效挺、黄文一：《战斗的足迹——北大地下党有关史料选编》，第233页。
- ④ 苏良才、苏明刚：《夏次叔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第24—25页。
- ⑤ 杜家贵主编：《北大红楼：永远的丰碑（1898—195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197—198页。
- ⑥ 《教育部查禁进步刊物的密令及有关函件》，北京大学档案馆藏，档案号BD1932014。

并不知先锋社在何处，刘北新为何人；似此情形，显系不肖之徒假借本校名义以利宣传”<sup>①</sup>云云，一概应付过去。显而易见，如果没有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理念的保驾护航，北大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必将遭遇更多挫折，取得的成绩和产生的效果亦势必大打折扣。毕竟，30年代初，执政根基逐渐巩固的国民党当局并不讳言，他们就是要加强对各级学校学生的思想言论和行为的管制，因此在宣传三民主义和推行党化教育方面不遗余力，对高校的压力也显著增大。1931年，国民党中央训练部明文规定：中等以上学校的党义教师须“时时与学生接近，藉以匡正其思想言论行动”，“随时调查学生平日所阅刊物及其所发表之言论”，“随时调查学生平日交友种类及其行动”<sup>②</sup>。并且，国民党教育主管部门还要求高校在招生时加试“党义”课程，并且规定考生“必须及格，方可录取”<sup>③</sup>。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北大马克思主义传播仍然得以持续开展并取得不俗成就，与其校风密不可分。

## 五、结 语

有学者曾撰文回顾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百年传播历程。关于土地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他指出“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分成两条战线，一条是党内战线，一条是党外战

线。”<sup>④</sup>这一结论无疑非常正确。换个视角来看，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主力军，主要就是由两路人马组成，即革命根据地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高校进步师生。正是因为这两大主力军的共同努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才得以冲破重重阻力，实现持续发展，造成广泛和深刻的影响。北大作为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高等学府，作为早期中共创始人的主要活动基地，它的前途和命运早已同马克思主义和中共紧密相连。1927年至1937年北大进步师生所从事的诸多途径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就是革命年代马克思主义在高校传播的一个缩影，也生动地彰显了其理论的生命力。

（本文作者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博士后、助理研究员 北京 100871）

（责任编辑 王志刚）

- 
- ① 《教育部关于密查“先锋”“社会研究”两刊物通讯人与北京大学的来往公函》，北京大学档案馆藏，档案号 BD1933018。
  - ②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教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085页。
  - ③ 《北京大学史料》第2卷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881页。
  - ④ 杨金海等《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中华民族的百年命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年第4期。